

# 日本侵華內幕(五)

## 一九一八事變陰謀

森島守人著。陳鵬仁摘譯

一九三二年九月，日本簽訂日滿議定書承認滿洲國，決心推進大陸政策；因此，人們的注意力遂集中在北滿的對蘇關係。陸軍內部，在爆發柳條溝事件時，就有「必要時也要攻打蘇聯」的強硬論，惟由於關東軍的自制和蘇聯的慎重態度，日軍開往北滿時才沒有發生重大事件。

當時，蘇聯在西伯利亞的軍備還不够充足，國內情勢也非常不安定；所以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對於順便到莫斯科訪問的大使芳澤，李托維諾夫曾非正式地提議，要跟日本簽訂「俄日互不侵犯條約」。芳澤就任外相以後，由於發生上海事件，李頓調查團前來滿洲，因為五·一五事件犬養內閣提出總辭職等等，因此日本政府沒有正式處理上述的提案，但日本政府承認滿洲國以後，便開始討論它。

### 軍部反對接近蘇聯

關於這個問題，從莫斯科回國的大使廣田弘毅認為，應該先解決諸懸案，然後再談互不侵犯條約。相反地，滿洲國的外交次長大橋以爲廣田案不够積極，而主張「即時和無條件締結協定」，

理由是爲謀求滿洲國健全的發達，必須先消除背後的威脅。又，一九三二年夏天，新設滿洲國大使館的新任參事官川越茂（日後的駐華大使），以「蘇聯之所以不敢挑戰，乃由於日本軍備和日軍進擊蘇聯的形勢。因此，我們不能自棄這種有利的武器；如果這樣做，徒將加強蘇聯的立場，導致對蘇交涉上的不利而已。」，因此反對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那時候，我內定奉派到哈爾濱工作，於是問了新任關東軍參謀長小磯的意見，他坦率地說：「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日本國內可能出現減少軍事預算的主張；軍部如果有人反對互不侵犯條約，就是基於這一點。因此假若能把條約的期限定爲三年或五年，也就可以因應條約失效後之需要的理由，或能够一方面把『縮小軍備論』壓下去，另一方面說服軍部的反對。總之，關東軍對這方面沒意見。」而原則上表示贊同。我的想法與上述的意見有些出入。我倒覺得，在「蘇滿」之間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遠比「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實際而可行。

事實上，當時的陸軍內部，荒木（貞夫）、

真崎（甚三郎）等的勢力仍然很大，其底下之參謀本部的小畑敏四郎少將，和陸軍省鈴木貞一上校等對蘇強硬論者還是主流。加以政友會的森恪和外務省的情報部長白鳥（敏夫），也是反蘇派的同路人，亦即鈴木、森恪、白鳥的携手，在實際政治上是個不可忽視的勢力。此外，這時在日本國內共產黨非常猖獗，因之，國本社等右翼團體極力反對日本與蘇聯接近。

在這種情勢之下，我認爲如果太公開主張蘇日互不侵犯條約案，勢將助長反對論者的團結，否則爲了削弱反對論的口實，至少在表面上，以偽裝倡說締結蘇滿間的條約爲宜。爲此，應該先簽訂蘇滿互不侵犯條約，迨至適當時期，基於日滿議定書第二條共同防衛的規定，日本再採取確認它的方式比較實際；所以我告訴大橋我這個意見，並希望利用他作爲滿洲國外交次長的地位，全力實現這個案，可是大橋却堅持他的主張到底。

### 日蘇關係漸趨惡化

大橋回到東京以後，訪問各界，以他獨特的

熱衷和耐性，力倡締結蘇日互不侵犯條約的必要，結果，如所逆料，使反對論者態度硬化。不特此，外務省本身的意見也不一致。白鳥以如果是帝俄還無所謂，與不同其國體的蘇聯之合作，從主義上的觀點而絕對反對；並且認為，史大林政權的基礎，祇要從外面加以壓迫，將很快地崩潰。

歐亞局長松島肇（後來的駐義大使）以為，蘇日之間既然有北京條約和非戰條約，互不侵犯條約將是重床疊架，但這是法律上和技術上的議論，殊不值得重視。其中，有田次官和谷局長全面地贊成我的意見，惟認為倡之過早，反而於事無補，因此要我把這個問題交給東京，趕緊回任所。

我回到奉天後，於十二月前往哈爾濱就任新職（哈爾濱總領事——譯者），並期待有田、谷兩人的努力；但日本政府終未獲得結論；而自蘇聯非正式提議此案以後八、九年，一直擺在那裡。在這期間的滿洲，陸續發生紛爭，德日締結防共協定等等，蘇日關係日趨惡化下去。基於這種觀點，我認為日本在外交上失去絕好的機會。

## 促蘇出讓北滿鐵路

我到哈爾濱任職的一九三二年底，俄日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還未上軌道，但北滿鐵路出讓問題則於一九三三年五月，由李托維諾夫向日駐蘇大使大田（爲吉）正式提出，並已經開始談判。在當地的我們覺得並希望，縱令互不侵犯條約沒具體化，但只要北滿鐵路的交涉還在繼續，

至少有「不可侵犯的事實」；總有一天會從這個事實關係發展到條約關係，而爲改善俄日關係悉力以赴。

原來，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廣田大使，其經過是這樣的：我還在奉天工作的一九三二年夏季，北滿鐵路東部線的小城市一面坡曾被反滿軍所襲擊，爲了保護日僑，關東軍認爲需要派兵。從九一八事變以還，蘇聯當局對於關東軍的鐵路輸送，都很簡單地予以承認；可是，這次蘇聯的作答，却一再地拖延。我受司令官本庄之托，照會莫斯科的大使廣田，而廣田的回電竟說：「關東軍對北滿鐵路當局，提出要其總括上和原則上答應全線義務輸送日軍的要求；蘇聯政府認爲這是超越技術上範圍之重大的政治問題，因此正在慎重研究中。」

而調查結果是，在哈爾濱設有線區司令部（相當於Railway Transportation Office）的司令官，交涉派兵一面坡之際，考慮到今後的需要，自行裁量提出全線的要求所導致。經過日方的解釋後，蘇聯便很快地同意對於一面坡的軍事輸送。就這種問題正在與加拉罕會談的廣田，順便試探對方的意向說：「這樣一個一個解決地方性的案件，對於蘇日關係的改善並不會有太大的幫助，此時此地，我們不如從大局來對大的政治問題下手。」

對這，加拉罕反問：「有沒有什么具體的方案？」廣田答說：「可否考慮出讓北滿鐵路？」於是，不久遂由加拉罕向廣田正式提出蘇聯擬出讓北滿鐵路的官方意見；繼而廣田想試探其價錢

等等。惟日本政府命令廣田不要再深入，所以出讓北滿鐵路問題，也就不了了之。

當時，陸軍內部和滿鐵本身的多數人看法是，收買北滿鐵路的事不必太急；因爲計劃中的新鐵路完工時，北滿鐵路將爲日本的鐵路網所包圍，其存在價值自然會隨之而減少，我們不如等着熟柿之落地；這點，可謂打小算盤的短視之見。在北滿的蘇日兩國機關，都贊成開始出讓的交涉；惟急躁的關東軍想令蘇方重新提起這件事，而出於在滿洲里停止蘇聯鐵路的延伸，和壓迫蘇聯鐵路員工的高壓態度。

就心這種情勢的大使大田，在莫斯科一再商議結果，蘇聯政府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正式決定要開始出讓的交涉，並向大田提出。本來，蘇聯之決心出讓北滿鐵路，實來自前駐日大使托羅雅諾夫斯基和駐哈爾濱總領事斯拉夫斯基的建議；而在兩年左右的交涉期間，斯拉夫斯基總領事之所以這樣熱心，其理由可能在此。

當時，斯拉夫斯基三十六、七歲；他在二十歲前就離開大學，加入共產黨，當過秘密警察和赤衛軍，同時以外交官身份在蘇聯勢力與外國勢力接觸的最尖端國家波斯（伊朗）、土耳其等國家服務；九一八事變爆發，即被派到哈爾濱，然後就任駐日本大使。做爲駐北滿的官員，他統率着蘇聯的各機關，對於北滿鐵路的立場和發言，似比駐日大使尤勒涅夫有權威，猶若蘇聯駐遠東的代表。

## 不照規定交手掙角

北滿鐵路終於決定由滿洲國收購，並於一九三三年五月開始談判。在七月三日的會議席上，雙方開出價錢，蘇聯要三億五千萬盧布，滿洲國祇出五千萬元，相差太大，因而會議即時停頓。在召開正式會議之前，沒有事先非正式地交換意見，對於有關會議經過的公報，又沒有互相商量而雙方各自發表；這種做法，與不按照規定比賽掙角一樣，絕不是辦法。

而且，要在蘇、日、滿間險惡的空氣中進行交涉，必須避免當地的不必要摩擦，可是，當地的實際情況却恰恰適得其反。是即在第一線陸續發生破壞東部線軌道的情事，以及顛覆列車，非法佔據北滿鐵路的財產，逮捕和監禁蘇聯人等事件。日方把破壞鐵路和顛覆列車宣傳為蘇聯妨害在東部國境築造要塞的行爲；但事實上，多是沿線日軍和滿系機關所嫉使。

一九三三年九月，滿洲國以攪亂治安爲理由，逮捕了六名蘇籍北滿鐵路的員工；會議因之完全中斷。更壞的是，十月上旬，發生塔斯通訊社以日滿有以實力奪取北滿鐵路的陰謀，而揭發大使斐刈（隆）對外務省拍的六封電報的事件（其中一封是我發給斐刈大使的）。日方以爲這是蘇聯惡意的宣傳，而加以否定，但這是真正的官方電報。軍方的一部份人甚至於認爲，這是我與歐亞局長東鄉等欲促進交涉所採取的措施，亂猜一場；但以我的名義所發的電報是我出差長春參加全滿領事會議時，哈爾濱總領事館發的，至於我自己，我回到哈爾濱以後，從金庫取出來電信案纔看到。

### 機密洩漏再度談判

蘇聯如何取得這些電報，至今不明，但我相信這是從長春出來的。因爲在長春的日本記者之間，有十天之內必能拿到幾份副本文件的說法；滿洲國有太多不懂得密碼之重要性的人；滿洲國內有許多複雜份子，沒受過充分訓練就去擔任官吏，因此這從長春漏出來的可能性最大。

如此這般，開始會議經過一年半，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斯拉夫斯基突然來訪問我，並跟我肆無忌憚地懇談很長時間；這時我獲得祇要解決六名員工的逮捕問題，會議必能即時重開的印象。於是一進元月，便開始非正式的議商，十八日，我倆之間成立了如下的了解：六名之中三名令其自動辭職後回國；其他的三名則回到北滿鐵路的原單位工作，日滿政府同意這個方案，就重開會議。

由於斯拉夫斯基特別提到，如果日本政府不立刻同意，尤列涅夫大使很可能提出不同的意見；所以我們極力要求東京妥善處理。可是東京却以斯拉夫斯基與尤列涅夫的話有出入，莫斯科的眞意尚有疑問，而來了應該暫時延期釋放的電報；因此會議又失去了重開的良機。爾後，滿洲國因爲實施帝政，以大赦的意思，自動釋放了這六個人，因此會議遂於二月下旬重新開始。

### 訂下互不侵犯條約

三月十日左右，我突然接到說決定於三月十三日上午十時要簽字的東京急電。但從蘇滿間

就技術問題所作實地交涉的進展情形來看，二十三日簽字是辦不到。所以我向東京報告這個情況；可是東京却即時回電，要我介入蘇滿之間，由我裁量，在二十三號以前把它全部解決。

在實地，未解決的案件有北滿鐵路借貸對照表的編造，以北滿鐵路爲被告之訴訟事件的處理和北滿鐵路財產表的編造等三件。惟由於蘇滿之間的意見和資料有很大的距離，要早日處理，恐有困難。所以主要地由斯拉夫斯基和我來從事政治折衝，我也就不一一與滿洲國和陸軍協議，而自行獨斷處理。有關借貸對照表和訴訟事件的了解，乃爲條約的附屬文書所必需，因幾十年來它一直在蘇聯實力之下，要編造一個借貸對照表，得過目充滿幾個房間的文件；加以有蘇日滿三國語文，因此最後的三天，蘇聯總領事和我，日以繼夜，不眠不休地趕，直至簽字前一個小時的二十三日上午九點纔全部談妥。

自來，要出讓像北滿鐵路這樣長的鐵路，應該從調查完了的部份先移交，或者全部調查完了之後再移交；如果這樣做，則需要很長的時間，而在這期間，隨時有變卦的可能。廣田外相考慮到這一點，所以不等事務上的處理，就從政治立場來決定簽字的日期，這確是一種政治卓見。最後，我想談談實行出讓北滿鐵路之蘇方的態度。他們連一支已經用過的鉛筆，一張舊紙都搞得整整齊齊列入移交；移交時，在嚴肅而莊嚴的儀式中，降下北滿鐵路旗，升起滿洲國國旗，堂堂正正，充滿禮讓的態度。這比諸以前要把山東鐵路出讓給中國時，日本員工在移交之前，竟

故意破壞財產，實有天淵之別。哈爾濱特務機關長安藤麟三少將說得好：「從蘇聯員工這種有訓練有節制的態度來判斷，紅軍的規律統制，一定非常之嚴。這對於下克上之風潮滔滔的日本陸軍來講，實不失為當頭棒喝」。

### 侵略華北浪人橫行

滿洲獨立的結果，因為地理上、民族上、經濟上不可分割的關係，華北問題遂自然增加其重要性。尤其是張學良政權以京津為根據地，從事反滿運動，因此關東軍更加關切。與蘇聯的關係，幸好正進行着北滿鐵路的交涉，所以能獲小康狀態；但華北的情勢，却日趨惡化。

一九三三年春天，關東軍擬趁熱河作戰之餘勢，一舉攻下中國的京津地區，惟迄五月間，由於成立塘沽停戰協定，事態又告安定。基於這個協定，在河北省北部的所謂冀東地區，設立了非武裝地帶。在關東軍方面來講，是它對於華北獲得優越的地位；對中國方面來說，是它在長城一線阻止了關東軍的入侵，雙方還算是「滿意」。如此這般，而有廣田三原則的聲明，有吉(明)、汪(精衛)會談等。中日關係開始有改善的預兆，中日兩國暫時把滿洲問題擺在一邊，進入懸案的交涉；結果實現了滿洲與華北的通郵和鐵路的聯絡。

但是，具有推進大陸政策的野心，以為祇是滿洲的資源還不够，而着眼華北富源的關東軍，自不放棄對於華北的侵略，因此關東軍遂以非武裝地帶的根據地，用盡辦法，着手所謂的「華北

特殊工作」。隨即相繼發生外交部長汪精衛被狙擊的事件和外交次長唐有壬被暗殺的事件，至此，逐漸改善的中日關係，又再度逆轉。

在非武裝地帶內，有無數之由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操縱的土匪和浪人橫行無忌；一九三五年五月，以天津租界內親日派報社社長被殺為轉機，在關東軍踏進關內的威脅下，締結了所謂「梅津、何應欽協定」。中國國民黨黨部和中央軍由河北省撤退，二十九軍的宋哲元成為京津的實力者。大約與此同時(六月)，乘日本軍人在張家口被中國軍扣留的機會，簽訂所謂「土肥原、秦德純協定」，自此，中國國民黨機關全面地由察哈爾撤退。

### 冀東走私自由飛行

在另一方面，對於內蒙古，關東軍正在計劃建立以德王為首揆的自治政府；而以這一連串的工作為基礎着手的就是華北五省的自治，亦即華北之分離中央的運動，其具體表現則是以殷汝耕為主席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這個政府以非武裝地帶的冀東二十三縣為其統治區域，以五色旗代替青天白日旗，採取半獨立型態。就南京政府而言，領土的完整和行政的統一最為重要。而在上述情勢之下，有兩個問題值得注目，一個是所謂冀東貿易，另一個是所謂自由飛行，而這兩者都是關東軍的產物。

對於冀東地區的非武裝，日軍無理地要求海關巡邏船的非武裝。而關東軍便乘沒有武裝，以冀東地區為大本營，在許多無賴的實力擁護下，

大搞其走私的勾當。走私品在京津地區不必說，從山東一時甚至於達到長江流域，因之大大地損害了列國的正當貿易，從而成為國際關係上的一大問題。而在日本商社之中，充當走私頭目的是以前曾列名實業同志會之加納某所經營的大隆公司。許多中國人認為，這個公司名稱係來自外交長大橋的「大」字和關東軍田中隆吉上校的「隆」字；但他們兩個人却跟它沒有任何金錢上的關係，這是我特別要說明的一點。

另外，關東軍以要監視非武裝地帶內是否撤除武裝的名目，跟這個地帶開始航空聯絡。由於沒有經過中國的同意，人們把它稱為自由飛行；後來更任意飛到山東，並且不僅軍用，甚至於公然定期輸運一般旅客，其為侵害中國主權，自不待言。

### 成都日本記者被殺

我自一九三五年十月至翌年七月，在柏林服務(擔任駐德大使館一等書記官——譯者)，八月回國，隨即接到出任東亞局長的密令，而正在準備前往中國考察時，在成都發生了日本記者被殺的事件。這時，擬前去成都上任的領事岩井英一，未能獲得南京政府的諒解；而在重慶停腳的時候，先行擅自插足成都的日本記者，因為激起民衆的憤怒而被殺。此時，陸軍的慎重，簡直令人不敢相信；他們之毫無動靜，與一年後的蘆溝橋事件時相比較，實有天淵之別。這可能與於那一年，開始以蘇聯為目標的五年計劃有很大的關係。

我首先到上海和南京，在這兩地，對於成都事件的解決，有硬軟兩論的對立。那時，還在上海的大使館是這樣主張：「現在中日間的氣氛既然不好，成都事件應該趕緊解決，我們不能以此為藉口，而提出其他的問題」；反此，南京的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却非常強硬。也許是因為他親手經辦很多懸案的緣故，所以主張乘此機會全面地解決諸懸案，並親自給外務省打電話，抨擊大使館的意見：不等外務省的訓令，就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懸案一覽表。強硬論者的主要意見是，不解決華北問題，則無以根本解決中國問題。我

繼而由南京到漢口，在此地，也發生了總領事館警員吉岡被槍殺的事件；人們正在議論長江上游日本僑民的撤退問題，羣情騷動。

### 侵犯綏遠會談中止

結果外務省採取了總括交涉諸懸案的方針，而對於華北問題，在交涉過程中，如果可能，則希望造成將來還有會談的餘地。大使川越再度與蔣先生懇談，而跟外交部長張羣的交涉也比較順利；眼看交涉順利的外務省，遂逸出當初的方針，過分貪戀於華北問題，並在拖延交涉的期間，

更發生了所謂綏遠事件。這是該年十一月，在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直接指揮之下，田中隆吉上校率領德王和李守信的蒙古軍，打着「建設蒙古人的蒙古」之大旗，入侵綏遠省，却被中國的傅作義部打得頭破血流，田中乘飛機逃走僅免身死的事件。

蔣先生以無法瞭解為調整國交，正在進行友好會談時，竟又出現新侵略之日本政府的兵意，而通知停止會談。至此，調整國交的企圖又再受挫，於是日本政府遂不得不於十二月下旬，單獨解決成都事件，以敷衍一時。（未完待續）

## 中外文庫

### 之三十一

#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台幣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册七〇元下冊七〇元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 中外文庫

### 之二一

#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